

# 陈荣捷英译哲学典籍的杂合特点探究

马冬梅

(兰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甘肃兰州730050)

**摘要:**借助后殖民翻译研究中的“杂合”理论,分析了旅美学者、哲学家陈荣捷先生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译本,指出其译文在语言、文化和文学三个方面既具有汉语语言文化特质,同时也具有英语语言文化特质,表现出典型的杂合特征,对促进文化间的平等交流和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文化建设;典籍英译;后殖民翻译研究;杂合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志码: A

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包括中国本土学者、外国学者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华裔学者三个群体。目前学界对于第一个群体如冯友兰、牟宗三等学者的研究广泛而深入,而对于外国学者及华裔学者的关注则相对不够。由于生活经历、文化传统和学术环境等方面的差异,这两个群体对于中国哲学的观察可能更具客观性和批判性。因此,笔者认为在关注中国本土学者研究成果的同时,也要重视异质文化传统中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陈荣捷先生是华裔学者中一位杰出的哲学家,他长期研究中国哲学并勤于著译,出版了大量的作品。他的翻译作品主要是中国古代哲学著作,如《道德经》、《近思录》、《传习录》、《北溪字义》、《六祖坛经》<sup>[1]</sup>等,他最重要的译著是被英语世界公认为关于中国哲学最权威的论著之一的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陈先生一生致力于向西方全面系统地翻译和介绍中国哲学,被誉为“向西方介绍东方哲学文化思想最为完备周详的中国大儒”<sup>[2]</sup>,“西方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推动

者和东西文化沟通的元老”<sup>[3]</sup>。然而这样一位一生以中哲西传为己任,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和翻译家,他的名字却没有太多的人知道,国内学术界尤其是翻译研究界对其关注也很少,对其翻译特点的研究更不多见。笔者拟借助后殖民翻译理论,从“杂合”的角度来研究和考察陈译作品的特点,揭示其译本的文化价值和文学价值,以使国内读者对陈荣捷先生的翻译事业有所了解。

## 一、后殖民翻译理论及其核心概念“杂合”述要

“后殖民主义”是萌芽于19世纪中叶的印度,随着20世纪中期欧洲殖民体系的瓦解而逐渐发展于文化界和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一种反霸权思潮,它关注后殖民时期原宗主国和殖民地文化地位的差异,独立后的前殖民地国家如何摆脱前宗主国的文化束缚及其在语言、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体现。“后殖民主义研究”深受福柯权力话语理论

收稿日期: 2014-12-03

基金项目: 甘肃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2013B-041); 兰州理工大学科研项目(201310); 兰州理工大学学科发展基金项目(16-061402)

作者简介: 马冬梅(1982—),女,甘肃张掖人,讲师。

的影响,并糅合了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和法依的反殖民主义写作理论<sup>[4]</sup>,着眼于对现行西方的强势话语进行改写。学界一般认为1978年萨义德《东方主义》的出版标志着该理论的成熟,主要代表人物有萨义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等。作为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评话语,它关注对各类“中心”的解构与消解;作为一种文化政治理论和批评方法,它将宗主国对殖民地进行文化殖民的事实及后果纳入其研究范围,关注东西方文化权力话语的差异,揭露了西方强势文化如何通过文化帝国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等策略对非西方弱势文化进行操控和边缘化<sup>[5]</sup>。朱立元指出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当代意义就是要“消除东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倡导通过真实对话、以更包容的心态来面对东西方文化差异,从而建立一种从对抗到对话的新型关系,使东西方文化相互参照、互相贯通、共生,而不是一方消解一方”<sup>[6]</sup>。

随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跳出纯语言研究的文本中心主义,不再局限于寻求语言文字层面的对等,开始转向外部研究,关注翻译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政治等的关系,后殖民主义理论进入了翻译研究者的视界,研究者们构建了一系列关于翻译的概念、判断和喻说,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应运而生,其代表作之一是尼南贾纳的《为翻译定位:历史、后殖民主义与后殖民语境》。该理论深受权力差异理论的影响,深入考察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各种翻译实践,由此揭示译文转换背后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权力关系,既显现了翻译在殖民化过程中所散播的权利机制即翻译与霸权的共谋,同时也揭示了一系列“抵抗的历史”即翻译成为抵制宗主国文化工具的可能<sup>[7]</sup>。后殖民主义译论还借助新历史主义的描写方式观察和解释译者的价值取向、翻译行为和策略选择,认为通过翻译可以将两种文化带到一个平等交流与对话的空间,使殖民文化摆脱前宗主国的文化束缚。

霍米·巴巴将“杂合”的概念引入后殖

民主义文化研究,认为“杂合性”表现出了所有存在于歧视与压迫场所中的必然变形和置换,是“殖民权力生产力的标志”<sup>[8]</sup>。而“杂合性”则指的是“不同种族、意识形态、文化和语言互相混合的过程”<sup>[9]</sup>。在巴巴看来翻译不是两种语言或文化简单的二元对立,二者之间还存在一个“知识与拒抗空间”,巴巴称之为“第三空间”<sup>[10]</sup>。两种文化进行交流时,双方都放下以自我为中心的架子,通过这个“第三空间”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和翻译”,从而获得相互理解,构建新的“他者”文化,存在于这个“第三空间”并带有异质文化色彩的语言和文化就是杂合化的产物。“杂合”在后殖民理论这里明显被赋予了政治含义,旨在瓦解由于政治和经济不平等而导致的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操控,使其成为维护弱势语言文化、抵抗强势文化霸权的理论话语。后殖民翻译理论视翻译为两种文化在权力差异语境中不平等对话的产物,关注体现在文本中的语言文化价值观等多个层面的杂合化特征及其背后的权力运作。

首次在翻译研究中明确提出杂合概念的是莎夫娜、阿黛柏和铁莫契科。1995年,在其《作为跨文化交际的翻译——有冲突的接触》一文中指出“由翻译过程产生的并表现出一些在目标文化看来‘不正常,奇怪’特点的杂合文本是当今跨文化交际的一个特征”<sup>[10]</sup>,这些特点是译者有意识的决定,而不是译者能力有限所致。他们还认为所有的译文都是某种程度的杂合体,这种杂合体现在语言、文化和内容等最基本的层面。铁莫契科进而明确了杂合性翻译对消解殖民化的积极作用,认为翻译的杂合性削弱了殖民者的文化霸权地位,使翻译有可能成为干预、抵制宗主国文化的工具,打破知识歧视的构建。国内翻译界讨论“翻译杂合”的学者韩子满把“译文杂合”定义为译文中无法避免的那些来自原文、目的语文化中所没有的语言、文化或文学成分,如一些新异的词汇和句法、文化意象和观念以及叙事手法等<sup>[11]</sup>。在其专著《文学翻译杂合研究》一书中,他从语言、文

化和文学三个方面详细阐述了“译文杂合”,指出在语言方面,译文中总会出现一些不符合目的语习惯或规范的语言成分;在文化方面,是指译文中保留来自源语的文化意象、概念、典故等文化负载项;而文学方面的杂合是指译者在翻译时会将目的语所没有的一些体裁及叙事手法引入目的语,从而使译文具有杂合特点<sup>[12]</sup>。

毫无疑问,只要有文化接触就会有杂合。在翻译中无论译者采取哪种策略,其译文语言都会反映出两种语言文化的特征从而带有杂合色彩,只是杂合程度不同而已。翻译中“杂合”的作用不仅在于通过不同文化间的交流达成共识、增添普遍性,更在于通过移植转移他国文化的异质性,促进本土文化对异质文化的容纳和借鉴。笔者认为陈荣捷先生翻译的哲学典籍具有典型的杂合特征,既充分传达了原文的文化特色,又准确传达了原文的哲学内涵。

## 二、陈译作品的杂合特征

从宏观上来讲,不少近现代学者在研究翻译中国哲学时,都采用的是一种“以西释中”的路线,陈荣捷却认为不应该以西方哲学的模型来处理中国哲学,他在英译中国哲学著作时自觉保持中国传统哲学话语的特点,以凸显中西哲学之不同。从微观上来讲,他的译本表现出典型的杂合特征。在语言层面,他把较多的源语文本的语言特征引进了目的语文本;在文化方面,他将源语的某些文化特征引入了目的语文化;在文学方面,他将目的语读者所不熟悉的一种文学样式引进了目的语文本。

首先,来看语言方面的杂合。陈荣捷先生认为《道德经》除了一小部分,大部分章节都是押韵的,因此应该按韵文来翻译;此外,陈荣捷先生在翻译一些特有名词时,不仅找到英文中与之相对应的词,同时在括号中加注拼音,提醒西方读者这些词汇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其英语译文。在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 的附录部分,陈荣捷先生

列出了“仁”、“礼”、“鬼神”、“忠恕”等19个中国哲学中较难理解的术语的译法,例如他虽译“仁”为“humanity”,译“礼”为“propriety”,译“天”为“heaven”,译“中庸”为“the Mean”,但同时括号中加上拼音“Jen”,“Li”,“T'ien”以及“chung-yung”以示其含义并不相同。

例1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译文: What *Heaven* ( *T'ien Nature* ) imparts to man ... To follow our nature is called *the Way* ( *Tao* ) .

例2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译文: Chung-ni ( Confucius ) said, “the superior man exemplifies *the Mean* ( *chung-yung* ) ...”

例3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译文: The two are the same.

But after they are produced, they have different names.

They both may be called *deep and profound* ( *hsüan* ) .

这种在括号内标注音译和解释的方式更好地传达了中国的哲学文化,比较贴切。对一些文化负载词,他加了拼音之后又以注释的形式作了进一步阐释,如他对中庸的注释: “The term *chung-yung*, literally ‘centrality and universality’, has been translated as moderation, the Mean, mean-in-action, normality, universal moral order, etc. According to Cheng Hsuan, *yung* means the ordinary and *chung-yung* means using the Mean as the ordinary way.”<sup>[13]</sup>再如他在翻译“忠恕”时,用了“conscientiousness”和“altruism”两个词,这两个词已经表达了“忠恕”的基本含义,但他仍在括号里补充了音译“chung shu”。并在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 附录中加以注释,认为“忠”指涉自己而“恕”指涉他人,只用这

两个英文单词翻译难以表达“忠恕”的内涵<sup>[14]</sup>。

其次,是文化上的杂合。文化杂合主要体现在文本中表现语言文化独特性的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上。陈荣捷先生在翻译这些词时主要采用了异化方法,用音译的方式处理原文中出现的人名和地名;对于原文中出现的书名他先用音译,并在括号中辅以直译。

例4: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译文: Nature ( *T' ien* ,Heaven) operates with constant regularity. It does not exist for the sake of ( *sage-emperor* ) *Yao* nor does it cease to exist because of ( *wicked king* ) *Chieh*.

对于像中国古代的计量单位、官衔等这样的文化专有名词,他多是采用音译、直译或直译加注释的方式处理,如将中文的“里”译成 *li*,用 *presented scholar* 翻译古代的“进士”头衔,都充分保留了中国古代特有的文化色彩。再如陈荣捷先生在翻译《道德经》第31章“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时采取异化的策略,翻译为“*In auspicious affairs, the left is honored. In inauspicious affairs, the right is honored. The lieutenant general stands on the left. The senior general stands on the right. This is to say that the arrangement follows that of funeral ceremonies.*”<sup>[15]</sup>“尚左”、“尚右”是我国古代反映人或事物地位尊卑高低的观念,就吉事而言,以左为上为尊,以右为下为卑;而在凶事活动中,则以右为上为尊,以左为下为卑。陈译对中国古代文化进行了详细的阐释,译文不仅流畅地道,而且能够准确传达原文的哲学含义,给英语及西方文化注入了新的元素,使得英语的“纯洁性”和“权威性”受到挑战,掺入与译入语文化相异的异质文化成分,有助于增强读者的文化差异意识,并促进弱势文化获得合法性,参与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

最后,在文学规范方面,陈荣捷先生将西方读者所不熟悉的文学样式引入目的语文化,带来了译本在文学规范上的杂合。例如

《大学》和《中庸》都采用了西方读者所不熟悉的宣喻体,即以一段提纲挈领的论述开头,随后是一段引自《诗》、《书》或《论语》语录的发挥<sup>[16]</sup>。宣喻体的特点是用大词,含义抽象但概括面广,句式节奏感强,气势恢宏,给人以全局在握的感觉。如《中庸》前三句共15个字排出了天、命、性、道、教五个大词的结构关系,随后短短几句把慎独、未发已发、中和等几个核心概念及其意义和盘托出<sup>[17-18]</sup>。陈荣捷先生的译本让西方读者知道了世界上另外一种文学样式和文学规范的存在,使他们对中国文学有了一定的了解。

### 三、结 语

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成为当前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针之一,“如何加强中外研究”这一议题在翻译研究领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哲学典籍英译作为中译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深入研究。在后殖民理论的观照下,清楚地看到了陈荣捷先生哲学典籍英译文的杂合特征。后殖民理论强调文化地位或者权力的差异性,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核心概念“杂合”论肯定了翻译中译文与原文存在差异的必然性,认为杂合性是两种语言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不同文本相遇的必然结果,对不同文化间的平等交流和共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我国古代哲学典籍是我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结晶,它在思想内容、语言形式和文化意蕴等方面都有其自身独有的特点,陈荣捷先生的译本凸显了中国语言、文化及文学方面的差异性,带给英语世界一种新异的文体,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沟通提供了一个平台,有利于建立合理的交往伦理,消解文化霸权和文化失衡。但对陈氏哲学典籍英译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研究仍十分薄弱,有待于从其他角度和途径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对比和考证。

### 参考文献:

- [1] 刘敬国,项东. 中哲西传,一代宗师: 陈荣捷先生的翻译事业[J]. 中国翻译, 2012(2): 47-50.

- [2] 崔玉军. 陈荣捷和他的朱熹研究[J]. 中国哲学 2003(3):101.
- [3] 华霭仁. 陈荣捷(1901—1994):一份口述自传的选录[J]. 中国文化,1997(15/16):327-347.
- [4] 张柏然. 后殖民之后:翻译理论研究再思:后殖民主义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启示[J]. 南京大学学报 2004(1):111-117.
- [5] Selden R, Widdowson P, Brooker P. 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4.
- [6] 朱立元.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 [7] 张志强. 后殖民翻译理论观照下的赛珍珠《水浒传》译本[J]. 中国翻译 2010(2):44-48.
- [8] Bhabha Homi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4.
- [9] 姜蓓蓓. 论后殖民翻译研究中的杂合[J].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 2008(3):88-91.
- [10] 李新云. “第三空间”的构建:论后殖民理论对中国翻译研究的启示[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08(5):65-68.
- [11] 韩子满. 文学翻译与杂合[J]. 中国翻译 2002(2):54-58.
- [12] 韩子满. 文学翻译杂合研究[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 [13] 陈梅,文军. 《中庸》英译研究在中国[J]. 上海翻译 2013(1):21-25.
- [14] Wing-tsit Chan.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
- [15] 史书颖,冯静. 《道德经》三个权威英译本差异及深层原因:以辜正坤、陈荣捷、R. B. Blakney 译本第九章为例[J]. 边疆经济与文化 2013(11):150-151.
- [16] 徐珺. 汉文化经典误读误译现象解析:以威利《论语》译本为例[J]. 外国语 2010(6):61-66.
- [17] 洪斌,陈文安. 《中庸》节选英译本批评与鉴赏:以理雅各和陈荣捷译本为例[J]. 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 2014(8):150-153.
- [18] 王宁.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 Hybridization in Wing-tsit Chan's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ical Classics

MA Dongmei

(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of La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a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anzhou 73005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works into foreign languages which has drawn great attention since China pursues an “outgoing” policy in culture’s construction.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should be treated with due seriousness. The paper in light of “hybridization” in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studies gives an account of Wing-tsit Chan’s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ical classics and shows that Wing-tsit Chan’s version is characterized with hybridization for in giving salience to the features of both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s and cultures which can serve as a force in the fight against cultural hegemony and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an equal exchange betwee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Key words:** cultural construction;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studies; hybridization